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考克斯报告

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
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

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COMMERCIAL
CONCER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新华出版社

考克斯报告

——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
及商业关系的报告

(1999年1月3日上报国会，1999年5月25日公开发表)

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王振西 孙 晶 等译

王振西 校定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克斯报告：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王振西，孙晶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8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书名原文：U.S.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Commercial Concer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BN 7-5011-4527-X

I. 考… II. ①美…②王…③孙… III. 反华-政治报告-美国-1999 IV.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3771 号

0171019

考克斯报告

——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

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王振西 孙晶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5 印张 56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527-X/D·718 定价：60.00 元
(内部发行，限省部级以上)
(提请读者注意：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美国炮制《考克斯报告》是煽动反华 情绪破坏中美关系的一出闹剧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赵启正

(1999年5月31日)

以考克斯为代表的美国一些反华政客，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冗长的所谓调查报告，于今年5月25日公开出笼。这篇报告把中国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国防尖端技术和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科学技术都污蔑为从美国“窃取”或非法“获得”。对这种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

《考克斯报告》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各类人员、组织机构和手段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中国的科学家、学生、商人和官员以及职业情报人员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污蔑，是典型的种族偏见。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中国历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办自己的事情。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依赖“窃取”别人的技术来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国防尖端技术。中国国防科技的发展立足于自主开发，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

众所周知，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和核讹诈的年代，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在中美

建交前 15 年，1964 年 6 月 29 日中国就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地地导弹，同年 10 月 16 日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中美建交前 12 年，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就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氢弹；中美建交前 9 年，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自主开发任何国防尖端技术。考克斯等美国一些反华政客无视这一事实，极力贬低并否定中国人民开发国防尖端技术的创新能力。

《考克斯报告》攻击中国长时间广泛“窃取”美国的各种军事技术，但通篇从头到尾都用“似乎”、“大概”、“如果”、“可能”、“或许”、“将来或许会”等猜测性语言，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没有任何确凿的具体的事实，竟然就判定中国有组织地广泛“窃取”美国敏感技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是十分荒谬的，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克斯报告》还把调研公开资料 and 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这种正常的学术活动，说成是“窃取”美国技术情报，这是十分可笑的。它所采取的方法是先认定中国有“窃取”行为，然后主观臆造、东拼西凑甚至蓄意捏造。我顺便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考克斯报告》提到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本来依据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 1964 年提出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中国从来没说其他国家使用这一思想是窃取。

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核武器的发展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中国从来没有像《考克斯报告》中所说那样，从美国核武器实验室“窃取”机密。实际上，《考克斯报告》中所说的 W56、W62、W70、W76、W78、W87、W88 这七种核弹头的性能数据早已在美国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不是什么秘密，更谈不上“窃取”。例如，1984 年托马斯·B·科克伦等著的《核武器手册》第一卷《美国的核力量和能力》，1988 年丘克·汉森撰写的《美国核武器秘史》等，对上述几种核弹头的威力、重量、

长度、直径、所用材料、圆概率偏差等性能数据以及研制单位、配备的运载系统、装备的军种均有详细介绍。作者还特意说明，书中引用资料均来自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美国能源部三大核武器实验室和国防部，以证实其权威性和可靠性。而且，近几年来，在国际互联网上随时可以看到美国从早期的 MK—1 到最新装备的 W88 核弹头的性能数据。

《考克斯报告》称，美国进行了约 1030 次核试验，而中国只进行了 45 次核试验，却研制出在技术上与美国相近的先进的热核弹头，报告在这里闪烁其词，暗示中国是因为“窃取”了美国核技术，才做到这一点，否则是不可能的。这种逻辑是十分荒谬的。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取得的每一项科技进步，特别是比美国发展快的科技进步，都是靠从美国“窃取”技术来实现的。这是极其狂妄的。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中国这一成就是在美国进行严格封锁情况下取得的。这一事实恐怕是美国某些反华政客无法否认的。

《考克斯报告》对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进行了大量的歪曲。中国航天事业开始于西方国家禁运和封锁的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中近程导弹、远程火箭、潜艇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返回式卫星、一箭多星、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都是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下独自完成的。1985 年，中国宣布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时，已经具备了高、中、低三种轨道各类卫星的发射能力，积累了 20 次成功发射的经验。1990 年，中国首次进行国际商业卫星发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其入轨精度是该公司 31 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上述事实均表明中国航天技术已跻身于世界航天先进行列。

商业卫星发射是空间技术的和平运用，是互惠互利的正常商

务活动。《考克斯报告》诬称，中国通过商业发射“获取”了美国的制导技术并推进了中国导弹的发展。这完全是一种移花接木、欺世惑众的说法。尽管中国早已有高精度的导弹制导技术，但稍具科技常识的人都知道，商业卫星发射决定了只需要采用精度适中、经济合理的制导系统，而没有必要采用弹道导弹那样高精度的制导系统。通过商业发射能提高导弹制导精度，如果是外人这么说还可以理解，但出自美国国会专门委员会的所谓调查报告，就太令人惊诧了。《考克斯报告》用大量篇幅渲染 1995 年和 1996 年中国两次商业卫星发射故障，认为故障原因的判定都是在美国专家指点下完成的，中国因此改进了运载火箭技术并用于导弹，简直是无稽之谈。火箭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各种飞行数据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有自行研制火箭 30 多年的历史，经历过无数次成功与失败，难道排除故障还需要别人指点吗？况且中国人的火箭设计细节，当然也不能轻易向外人泄漏，美国人不知底里，又如何指点？中国既然有能力独立成功地研制运载火箭，当然有能力解决飞行中的技术问题。中国从来没有、也没有必要通过故障调查“获取”美国敏感技术。

中国发射美国卫星是严格按照两国政府间协议进行的，美制卫星的安全完全由美方实行每天 24 小时严密监控。而《考克斯报告》却称，“当美国制造的卫星、相关设备和文件都在中国时，如果中国不利用美国监控的某些疏漏，这是令人奇怪的”，找不到任何证据说明中国通过商业发射“窃取”美国敏感技术，就采取这种主观臆断的方法妄加推测，才是真正怪事！

《考克斯报告》不仅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和导弹技术，而且还攻击中国将美国高性能计算机、民用航空、精密机械等先进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并据此建议要全面加强对中国两用商品和技术出口的控制，甚至无理要求中国建立所谓的公开和透明的制度，能使美国指定的美国国民在不事先通报的情况下，对最

终用户进行就地检查。这是无视中国主权、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霸权行径，中国绝不会答应。

不久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考克斯报告》选在这时出台，完全是别有用心，是美国一些人近年来制造的一系列反华事件后又一股反华逆流，他们的目的是转移视线，煽动反华情绪，诋毁中国形象，试图把中美关系拉向后退，遏制中国发展。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维护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

事实胜于雄辩，谎言不攻自破

——再驳《考克斯报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9年7月15日)

5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对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公布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简称《考克斯报告》）发表谈话，指出炮制《考克斯报告》是煽动反华情绪、破坏中美关系的一出闹剧。为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随后又进一步就该报告涉及的内容作了调查了解。大量事实表明，这份报告的实质是煽动反华情绪、破坏中美关系。为达到这一政治目的，报告不惜采用歪曲事实、移花接木、主观臆断、捕风捉影、蛊惑人心等种种卑劣手法。因此，报告的结论是十分荒谬的，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违反了基本的科技常识。报告出笼后，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也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的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

（一）危言耸听的谎言

《考克斯报告》危言耸听地攻击中国“偷窃”美国所有最先进的热核弹头机密情报，包括 W-88、W-87、W-78、W-76、

W-70、W-62、W-56等7种热核弹头，并称“中国在70年代末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窃取’了美国核弹头W-70（增强辐射弹，又名中子弹）的设计机密，于是才在1988年试验了它的中子弹”。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家的极大诬蔑。

众所周知，5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一大批才华横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科学家，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成功地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关，掌握了核武器技术。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1966年12月28日中国突破了氢弹原理技术，并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氢弹爆炸试验。在此期间，中国还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自卫核反击力量。70年代和80年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美国、苏联两国空前的核军备竞赛，数万枚核弹头的阴云笼罩在世界人民头上，也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不得不继续研究发展核武器技术和改善自己的核武器系统，并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

中子弹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很神秘，实际上它是一种特殊的氢弹。中国作为掌握了原子弹、氢弹技术的国家，经过不太长时间的努力就掌握中子弹技术，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考克斯报告》所列举的包括W-88在内的美国7种核弹头的结构、尺寸、重量、形状、威力、圆概率偏差以及服役时间等数据，在许多公开文献中和因特网上都可以查到，根本不是什么机密情报。仅在因特网上查到的关于中子弹的原理与结构的文章就有上百篇。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仅仅依赖这些数据也不可能设计出核武器。据报道，美国核武器专家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原负责人阿格纽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原负责人佛斯特在最近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就说过，“即使有核弹

头大小、重量、形状和当量等方面密级很高的数据，也并不代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核弹头设计”。佛斯特还认为，中国人所知道的是美国多年前所公开的数据，也就是说，是我们告诉了他们。这些数据既然不属于核武器的设计机密，《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窃取”这些资料发展了核武器就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是精心炮制但手法拙劣的骗局。

《考克斯报告》还说美国做了 1000 多次核试验，中国只做了 45 次就能掌握先进弹头技术，因此“猜测”中国一定“窃取”了美国的核技术机密。这充分表明考克斯等人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家的创造能力，时至今日，还死抱着种族歧视的观点不放。

《考克斯报告》十分武断地臆测“中国非常迫切需要从美国得到设计热核弹头的计算机软件，以便在从美国‘窃取’的核武器设计技术的基础上，来发展新的核武器”；又称“中国实际上已经得到美国的计算机软件程序，所包括的程序是 MCNPT、DOT3·5 和 NJOYC”。事实上，这三个程序是国际上近几十年来在核反应堆工程设计、核反应堆辐射屏蔽安全分析等核能研究领域广泛应用的的标准程序，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许多研究机构、大学和核能工程研究设计单位广泛应用，与热核武器弹头的设计毫无关系。

为了促进中国核电建设的发展，中国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从国际原子能机构无偿获得用于计算反应堆安全的计算机软件程序 DOT3·5，在 80 年代中后期又得到解决相同问题的计算机软件程序 MCNPT 和用于核数据研究的计算机软件程序 NJOYC。多年来，中国科学家不断把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计算结果及时地反馈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程序的编制单位。显然，中国科学家为这些程序功能的改进和完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任的成员，长期以来组织国内几十个大学和科研所投入

这一国际性的合作研究中。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和计算机软件，也经常提供给国际原子能机构，供各成员国分享。《考克斯报告》的炮制者把中国在世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事业中作出的积极贡献诬蔑为中国为了发展核武器“非法”获得计算机软件程序，这只能暴露他们对科学技术常识的无知，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还应指出，《考克斯报告》诬蔑中国“窃取”美国微聚变核爆炸试验和反潜艇微波技术之机密，这纯粹是无稽之谈。稍有科技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早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1964年就提出激光核聚变的初步概念，这在国际上也是属于最早的独立提出者之一。此后，中国就开始系统研究激光核聚变问题。1973年采用一路激光驱动氘冰，在实验上观察到中子；1974年采用一路激光驱动聚氘乙烯靶发生核反应，并在实验上观察到氘氘反应产生的中子；1986年中国采用直接驱动方式使氘氘玻璃靶球（CAPSULE）出中子；接着在1990—1992年间通过实验，用间接驱动方式实现热核聚变反应，观察到了热核中子。中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于敏院士和他领导的一批中国科学家在7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激光通过入射口，打进重金属外壳包围的空腔，以X光辐射驱动方式实现激光聚变的概念，并提出了在柱形黑腔中心放置靶丸的结构设计。接着，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建造了自己的用于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激光器——神光装置。后来，从美国解密的资料中发现，中美科学家几乎同时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提出了类似概念。这充分说明，科学规律是客观存在，人类不管用什么方法迟早都会掌握。如果考克斯等人能够认真请教专家，学一点科学知识，就不会闹出这种缺乏科学常识的笑话了。

随着世界经济、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密切，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交流与合作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中

美核科学家在许多领域开展了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应美方的邀请，中国有关研究机构与美国国家实验室从 90 年代开始开展了交流与合作，合作领域包括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和环境保护研究，并于 1998 年 7 月在北京共同举办了“材料保护控制和衡算的联合演示”（INTEGRATED DEMONSTRATION OF MATERIAL PROTECTION,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活动。美方在演示会上散发的宣传材料上指出，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美国能源部实验室和中国有关研究机构经过接触后认为，中美两国有关部门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促进双方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的理解和信任。

但是考克斯等人肆无忌惮地造谣说，“中国科学家借中美实验室交流与合作之机，广泛接触美国科学家，从中获得解决核武器物理和工程问题的情报”。还无中生有地说，“美国科学家也利用这种机会曾经向中国泄露情报，有利于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事实上，两国实验室间的交流与合作计划是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认可的，所涉及的领域也是严格限制在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和环境问题范围内的。参与中美实验室合作计划的两国科学家和官员都是十分认真和负责任的，他们非常清楚各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之所在，以及他们各自对自己国家的安全应尽的职责，他们绝不会在这种场合涉及各自国家的核武器机密。美国一部分反华政客对中美实验室间合作计划的无端指责，不仅玷污了中国科学家的尊严，也伤害了美国科学家的尊严。

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对执行实验室间合作计划的访问学者有着十分严格的保密和反情报管理制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负责人约翰 C·布劳恩博士曾在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关于中美实验室间合作计划的听证会上作证说，“对实验室的所有访问学者一律按美国能源部的保密条例来管理，实验室根据能源部的条例制定了若干保密措施和管理程序。保密

措施包括行政和实物控制等多种保护”。访问学者不得进入保密区，只能在美方人员陪伴下进入非保密区工作，访问学者也不得使用机密计算机网络。必须指出，所有中国的访问学者都是严格遵守美方保密规定的。《考克斯报告》无法举出哪怕是一个中方人员在美国武器实验室工作时违反保密规定的例子。由此可见，中国访问者根本不可能获得所谓的“核武器机密情报”。对于到中国来执行实验室合作计划的美方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美国也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布劳恩博士在同一次听证会上作证说，“我们的措施是访问者在访华前，对所有出访人员进行严格的反情报教育，并向访问者介绍中国的最新背景材料。回国后所有访问者必须汇报在华活动，并向所有有关的政府机构提供情况。我们还有一条措施，要求代表团人数每次不得少于2人，以减少被对方策反的风险”。实际上，美国对代表团来华访问的管理比布劳恩博士所说的措施更严格：代表团的学术论文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代表团访问结束前必须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汇报代表团在华活动；代表团在华居住的宾馆、原则上也由美方在美国本土预定；在华期间代表团一律集体行动。

考克斯等人在捏造中国“窃取”美国最先进核武器的设计机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国新一代核武器谎言”的同时，还十分耸人听闻地说，“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核弹道导弹力量将对美国构成现实的直接威胁”。

众所周知，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站在争取禁止核武器斗争的前列。但是，面临着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直接威胁，在世界上还存在着核讹诈、核垄断的时候，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能进行自卫。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正是在超级大国核威胁和核讹诈的情况下被迫而为的。中国是个爱

好和平的国家，早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中国政府就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几十年来，中国政府这一立场没有改变。中国被迫研制和发展起来的核武器，力量十分有限，完全是为了自卫，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对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构成威胁。

（二）缺乏基本科技常识的编造

《考克斯报告》蓄意歪曲中国航天发展史，称中国从美国“获取”的技术知识，帮助了中国的导弹和航天计划。事实上，中国航天事业从起步到成长，到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都完全是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完成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的情况下，1964 年中国就已经研制成功了中近程导弹，1970 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 年，中国又成功地发射了返回式卫星。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航天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80 年，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火箭获得成功；1982 年，中国潜艇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获得成功；1984 年，中国成功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这些都是在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之前完成的，同样，也是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下完成的。

《考克斯报告》称，“中国首先于 70 年代初在西方技术的基础上开始研制自己的通信卫星”。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起，美国和西方国家就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而且还成立了所谓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怎么可能依赖美国和西方国家来发展自己的卫星技术呢？该报告还称中国不择手段地“窃取”美国卫星技术，这更是荒谬的主观臆断。众所周知，中国真正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是在 1990 年，而从 1970 年至今，中国已成功发射 40 多颗不同

种类卫星，拥有研制科学实验卫星、返回式卫星、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等设计和制造的成熟技术。《考克斯报告》还把中国东方红三号卫星使用的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的控制处理器，说成是玛特拉—玛可尼公司制造的。这样明显的张冠李戴，恐怕不能算是报告炮制者的大意吧！

《考克斯报告》还谈到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回国之事，并以此为例污蔑中国导弹技术是从美国“窃取”的。对此，中国科学家感到极大愤慨。1935年，钱学森博士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身份到美国学习，后留美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青有为、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的钱学森博士向往祖国。但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政府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迫害。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钱学森博士于1955年回到祖国。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钱学森回国时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考克斯报告》称，由于钱学森曾参与美国“大力神”洲际导弹计划，从而将美国的导弹和相关技术非法带到中国。这是无中生有的诽谤。根据美国科学家协会（FAS）编写的“美国核力量的早期发展”资料，美国“大力神”导弹计划是根据1953年10月成立的美国空军“战略导弹评审委员会”（后称VON-NEUMAN委员会）的建议确定的。1955年美国有关部门才正式签订研制合同。而在这之前，1950年7月，钱学森就被美国政府取消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和自由，并被拘留。后虽被保释，但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始终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考克斯等人数万言的报告似乎作得很细，实际上连时间的先后都没有弄清楚，这恐怕不会是一时的疏漏吧！

1985年，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这本来是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一个方面，是正常的、规范的国际服务贸易。但《考克斯报告》却称中国通过商业发射“窃取”或非法“获得”美国

导弹技术，用于提高中国的导弹能力，这不仅违背了事实，而且也缺乏基本的科技常识。

稍有科技常识的人都知道，运载火箭是在弹道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运载火箭和导弹对制导精度的要求是不同的。火箭制导主要是控制卫星的入轨精度，而导弹制导需要控制动力飞行段、自由飞行段及再入段这三大段的偏差，最终满足弹头落点的命中精度。显而易见，导弹制导精度高于运载火箭的要求。商业卫星发射精度越高，成本越大。一般情况下，出于经济合理的考虑，商业发射不需要采用过高的制导技术。怎么会用火箭的制导技术来提高导弹的制导精度呢？

《考克斯报告》还称，中国通过商业卫星发射得到了美国运载火箭整流罩技术，这“也许有助于中国设计和改进未来的多弹头再入大气层导弹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及其可靠性”。事实上，中国有成熟的整流罩设计经验。早在1992年前，中国已研制成功两种整流罩，多次在冬季高空风条件下发射成功。中国在商业发射中所采用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的整流罩，是在长征系列火箭卫星整流罩10次成功飞行的基础上设计和生产的。中国不需要通过商业发射服务获取美国的火箭整流罩技术，中国在整流罩技术上的任何改进和发展都是依靠自己力量完成的。

更需要指出的是，运载火箭整流罩的设计技术与导弹多弹头整流罩设计技术存在显著的不同。多弹头导弹整流罩要求全天候、全方向的工作环境，一般采用整体式设计技术，而运载火箭通常采用横向分离式设计技术。因此，不存在利用火箭整流罩设计技术来改进多弹头整流罩的设计技术的问题。

《考克斯报告》称，中国通过铱星发射“获得”了智能分配器技术（SMART DISPENSER），用于多弹头分导再入式飞行器（MIRV）的分配技术。事实上，中国在发射铱星前，就多次成功地进行了多星发射。1990年7月，中国长征二号丙首次发射，